

乡村振兴背景下绿色农业 补贴政策的实施效果 与优化路径

李海亮, 刘新宇, 魏昕昱, 都冰冰, 郑博瑄

大连海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辽宁 大连

收稿日期: 2026年4月20日; 录用日期: 2026年5月21日; 发布日期: 2026年5月29日

摘要

在乡村振兴全面纵深推进、农业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双重背景下, 绿色农业作为衔接产业兴旺与生态宜居的核心载体, 已然成为破解农业资源约束、化解面源污染困境、实现农民增收致富的关键路径。绿色农业补贴政策作为国家宏观调控农业发展、引导农业生产方式绿色转型的重要制度工具, 其实施成效直接关系到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进程, 更深刻影响着乡村振兴的落地质量。结合农业发展要求与乡村全面振兴总目标, 从优化补贴结构、健全精准识别机制、强化全过程监管、完善多元协同支持体系等方面, 提出兼具针对性、可操作性与前瞻性的优化路径, 旨在进一步提升绿色农业补贴政策的实施效能, 推动农业生产方式向绿色化、集约化、可持续化转型, 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持久动力。

关键词

乡村振兴, 绿色农业, 农业补贴, 实施效果, 优化路径

Implementation Effects and Optimization Paths of Green Agricultural Subsidy Polic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Hailiang Li, Xinyu Liu, Xinyu Wei, Bingbing Du, Boxuan Zhe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Dalian Ocean University, Dalian Liaoning

Received: April 20, 2026; accepted: May 21, 2026; published: May 29, 2026

Abstract

Against the dual backdrop of comprehensively advanc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becoming a theme of the times, green agriculture, as a core vehicle connecting industrial prosperity with ecological livability, has already become a key pathway to overcoming agricultural resource constraints, addressing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and achieving increased income and wealth for farmers. As an important institutional tool for the state to macroscopically regulat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guide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methods,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iveness of green agriculture subsidy policies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sustainabl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more profoundly affects the quality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s implementation. In line with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requirements and the overall goal of comprehens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optimization paths with specificity, operability, and foresight are proposed from aspects such as optimizing subsidy structures, improving precise identification mechanisms, strengthening whole supervision, and perfecting multi-faceted collaborative support systems. These aim to further enhance the implementation efficiency of green agriculture subsidy policies,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methods toward greenness, intensiveness, and sustainability, and inject lasting momentum into comprehens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Green Agriculture, Agricultural Subsidies, Implementation Effects, Optimization Path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动农业发展，促进农业绿色转型。乡村振兴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其核心目标是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而绿色农业作为农业发展的核心形态，既是推动产业兴旺的重要支撑，也是实现生态宜居的关键举措，更是衔接生态保护与农民增收的重要纽带。当前，我国农业发展正处于从“数量导向”向“质量效益导向”转型的关键时期，面临着耕地资源约束趋紧、水资源短缺加剧、农业面源污染突出、农产品质量安全需求持续提升等多重挑战，传统粗放型农业生产模式已难以适应新时代农业发展与乡村振兴的现实需求，农业绿色转型迫在眉睫[1]。

在此背景下，以绿色生态为导向的农业补贴政策，作为国家支持农业绿色发展、引导农户转变生产方式的重要宏观调控手段，被赋予了更为重要的使命。自2015年我国启动农业“三项补贴”改革以来，逐步打破了传统以产量为导向的补贴模式，构建起涵盖耕地地力保护、有机肥替代、绿色防控、轮作休耕、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等多个领域的绿色农业补贴体系，补贴力度持续加大、覆盖范围不断拓展[2]。

2. 乡村振兴背景下绿色农业补贴政策的发展现状

2.1. 政策体系逐步完善，形成多元支撑格局

随着乡村振兴的全面推进与农业绿色转型的不断深化，我国绿色农业补贴政策经历转型。目前，我

国绿色农业补贴政策已形成覆盖生产、加工、流通、技术推广等多个环节，涵盖耕地保护、污染治理、技术应用、生态补偿等多个领域的补贴框架，核心政策主要包括五大类：一是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强化耕地资源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二是轮作休耕补贴，重点覆盖东北黑土地、黄淮海小麦玉米产区、南方水稻产区等区域，根据不同区域的生态条件与种植模式，引导农户合理轮作、休耕养地；三是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补贴，推动农业废弃物变废为宝，减少农业面源污染；四是绿色技术推广补贴，重点支持有机肥替代化肥、生物农药应用、智能灌溉、绿色防控等先进绿色技术的推广与应用，助力农户提升绿色生产技术水平；五是绿色农产品认证补贴，对获得“三品一标”(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的经营主体给予一定补贴，推动绿色农产品品牌建设[3]。

2.2. 实施规模持续扩大，覆盖范围不断延伸

近年来，政府高度重视农业绿色发展，持续加大绿色农业补贴资金投入，补贴规模呈现稳步增长态势。补贴资金的持续投入为农业绿色转型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撑。在补贴覆盖范围方面，绿色农业补贴政策逐步从传统的粮食主产区，延伸至特色农业区、生态脆弱区、农产品主产区等各类区域，实现了不同区域农业绿色发展的全覆盖。

从受益主体来看，补贴政策已覆盖农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各类农业经营主体，其中，重点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倾斜，引导新型经营主体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带动小农户融入绿色农业发展体系。截至 2023 年底，全国已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 10 亿亩以上，完成 10.58 亿亩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划定任务。2023 年我国耕地灌溉面积 10.75 亿亩，比 1952 年增长 2.6 倍，累计建成大中型灌区 7300 多处，建成泵站、机井、塘坝等各类小型农田水利工程 2200 多万处，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¹。

2.3. 实施成效初步显现，多维效益协同提升

经过多年的政策实践，我国绿色农业补贴政策的实施成效逐步显现，在生态、经济、社会三个维度实现了协同提升，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提供了有力支撑。

在生态效益方面，绿色农业补贴政策有效引导农户转变生产方式，减少化肥、农药、地膜等农业投入品的不合理使用，推动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取得显著成效。水稻侧深施肥、玉米种肥同播、小麦机械深施、水肥一体化等技术的推广应用有力促进了化肥减量增效。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4 年我国农用化肥施用折纯量 4988 万吨，较 2015 年减少 1,034 万吨，降幅 17.2%；同期，粮食产量从 2015 年 1.32 万亿斤增加到 2024 年 1.41 万亿斤，增幅 6.9%。这“一减一增”显示出在保障粮食稳产增产的同时，资源更加高效利用。此外，化肥利用率的提高还促进了农业节本增效，按照每年投入 2600 万吨氮肥计算，利用率每提高 1 个百分点，相当于减少尿素投入 56.5 万吨，可节约投入成本约 11 亿元²。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水平大幅提升，农业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为乡村生态宜居目标的实现奠定了坚实基础[4]。

在经济效益方面，补贴政策不仅直接增加了农户的收入，更引导农业产业结构向绿色化、优质化、品牌化转型，提升了绿色农产品的附加值。同时，绿色农业的发展推动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带动了农产品加工、乡村旅游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形成了“生态 + 产业”的融合发展模式，为乡村产业兴旺注入了新活力。

在社会效益方面，绿色农业补贴政策有效增强了农户的绿色生产意识，推动了绿色生产理念在农村的普及，引导更多农户主动参与农业绿色转型；同时，补贴政策推动小农户逐步融入绿色农业发展体系，提升了小农户的生产能力与收入水平，缩小了不同经营主体之间的发展差距。

¹https://www.stats.gov.cn/sj/sjjd/202409/t20240910_1956334.html

²https://zzys.moa.gov.cn/tzgg/202601/t20260106_6480464.htm

3. 绿色农业补贴政策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3.1. 政策设计层面：结构失衡，精准性与协同性不足

绿色农业补贴政策的设计科学性直接决定了政策的实施效果，当前我国绿色农业补贴政策在设计层面仍存在诸多不足，主要表现为结构失衡、精准性不足与目标协同性欠缺三大问题。

补贴结构不合理，重点不够突出。当前我国绿色农业补贴多集中于农业生产环节的直接资金补助，对绿色技术研发、绿色农产品品牌建设、市场推广、社会化服务等环节的支持力度明显不足，导致绿色农业产业链条的关键环节缺乏有效支撑，难以形成“生产-加工-流通-品牌”的全链条绿色发展格局。补贴标准设定不科学，激励效应不足。一方面，补贴标准“一刀切”现象普遍存在，未充分结合区域资源禀赋、生态承载力、绿色生产成本等差异制定差异化补贴标准，导致部分区域补贴标准过高、部分区域补贴标准过低，难以实现补贴资金的合理配置；政策目标协同性欠缺，难以实现多元效益统一。部分绿色农业补贴政策在设计过程中，未能充分衔接乡村振兴战略中产业兴旺、生态宜居、农民增收等多元目标，存在“重生态、轻效益”或“重规模、轻质量”的倾向[5]。

3.2. 政策执行层面：机制不畅，落地效率与质量不高

绿色农业补贴政策的有效落地，离不开顺畅的执行机制与高效的执行能力。当前我国绿色农业补贴政策在执行层面存在识别机制不精准、申请流程繁琐、区域执行差异大等问题，严重影响了政策的落地效率与实施质量。

补贴对象识别机制不精准，存在“补贴与生产脱节”现象。当前我国绿色农业补贴对象的识别主要依赖人工审核，缺乏完善的信息化识别体系，导致信息不对称问题突出，部分农户与经营主体对补贴政策的知晓度不高。

补贴申请流程繁琐，小农户申报难度大。当前绿色农业补贴的申请流程较为复杂，涉及农业、财政、环保等多个部门，申报材料要求繁琐，审批周期较长，平均审批周期达到 45~60 天，部分地区甚至超过 60 天。小农户由于文化水平有限、对申报流程不熟悉、缺乏专业的申报指导，申报成功率不足 30%，导致大量小农户难以享受补贴政策红利，补贴政策的普惠性难以充分体现。

区域执行差异大，政策落地“上热下冷”。由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地方财政配套能力存在较大差异，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由于财政实力有限，绿色农业补贴的地方配套资金不足，导致补贴标准远低于东部发达地区，区域间补贴差距较大。同时，部分地方政府对绿色农业补贴政策的重视程度不够，存在“重申报、轻落实”的现象，政策执行过程中敷衍了事，导致政策落地效果不佳，出现“上热下冷”的执行困境[6]。

3.3. 监管评估层面：体系缺失，资金使用效率偏低

完善的监管评估体系是保障绿色农业补贴政策有效实施、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的关键。当前我国绿色农业补贴政策在监管评估层面存在监管机制不健全、绩效评估不完善、资金使用效率不高等问题，严重影响了补贴政策的效能发挥。

监管机制不健全，存在骗补等违规现象。当前我国绿色农业补贴资金的监管主要集中在发放环节，对补贴资金发放后的使用情况缺乏全过程跟踪监管，导致部分地区存在虚报冒领、截留挪用、骗补等违规违纪现象，部分补贴资金未能真正用于绿色农业生产关键环节。同时，监管手段较为落后，主要依赖人工核查，未充分利用大数据、卫星遥感、区块链等现代信息技术，监管覆盖面窄、监管成本高、监管效率低，难以实现对补贴资金使用情况的全面有效监管。

绩效评估体系不完善,激励约束机制缺失。目前我国尚未建立统一、科学的绿色农业补贴绩效评价体系,绩效评估多侧重于补贴资金的发放数量、覆盖范围等量化指标,忽视了对补贴政策实施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综合考核。同时,绩效评估结果未与后续补贴资金分配、项目立项等挂钩,难以形成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部分地方政府与经营主体缺乏提升补贴政策实施效果的动力,导致补贴政策的效能难以充分发挥。

补贴资金使用效率不高,存在碎片化与重复补贴现象。当前我国绿色农业补贴资金分散于农业、财政、环保等多个部门,各部门之间缺乏有效的协调配合,导致补贴资金存在碎片化、重复补贴等问题,部分补贴资金被用于“面子工程”“形象工程”,未真正投入到绿色农业生产、技术推广、污染治理等关键环节,导致补贴资金的边际效益递减,资金使用效率偏低。

3.4. 主体适配层面:覆盖不均,小农户边缘化问题突出

绿色农业补贴政策的实施,应兼顾各类农业经营主体的需求,尤其是要保障小农户的合法权益,推动小农户融入绿色农业发展体系。当前我国绿色农业补贴政策在主体适配层面存在覆盖不均、小农户边缘化等问题,难以实现补贴政策的普惠性。

补贴准入门槛过高,小农户难以参与。多数绿色农业补贴项目设置了较高的规模门槛与资质门槛,如露地农业补贴要求种植规模在1,000亩以上,设施农业补贴要求种植规模在200亩以上,同时要求经营主体具备“三品一标”认证、注册商标等资质。小农户由于种植规模小、资金实力弱、技术水平低,难以达到补贴项目的准入要求,且“三品一标”认证成本较高,单项认证费用超过5,000元,进一步增加了小农户的参与难度,导致大量小农户被排除在补贴政策之外。

补贴受益比例失衡,小农户受益有限。当前我国绿色农业补贴资金的分配存在明显的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倾斜的现象。这种受益比例的失衡,不仅加剧了不同农业经营主体之间的发展差距,也违背了补贴政策的普惠性原则,难以充分调动小农户参与绿色农业发展的积极性[7]。

配套服务不足,小农户绿色转型能力薄弱。绿色农业补贴政策的有效实施,离不开完善的配套技术培训与指导服务。当前我国绿色农业补贴政策多注重资金补贴,缺乏配套的绿色生产技术培训、技术指导、市场对接等服务,小农户由于缺乏绿色生产技术与市场信息,即便获得补贴资金,也难以有效开展绿色生产活动,难以实现农业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导致补贴政策的实施效果大打折扣。

4. 乡村振兴背景下绿色农业补贴政策的优化对策

4.1. 优化政策设计,构建差异化、协同化补贴体系

针对当前绿色农业补贴政策设计层面存在的问题,应坚持“精准化、差异化、协同化”的原则,优化政策设计,构建更加科学合理的绿色农业补贴体系,提升政策的针对性与协同性。

调整补贴结构,聚焦关键环节。推动绿色农业补贴从“普惠式”向“精准式”转型,压缩非必要的普惠性补贴资金,将补贴重点向绿色技术研发、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绿色农产品品牌建设、市场推广、社会化服务等关键环节倾斜,加大对绿色农业产业链条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构建“全链条、全方位”的补贴支撑体系。同时,设立“生态补偿专项补贴”,将补贴资金与耕地质量提升、农业污染减排、碳汇增加等生态效益直接挂钩,实现“生态优则补贴优”,引导经营主体主动追求生态效益。

制定差异化补贴标准,强化激励效应。建立“区域分类+主体分类+效益分类”的三维补贴标准体系,结合不同区域的资源禀赋、生态承载力、绿色生产成本,制定差异化的补贴标准,对生态脆弱区、粮食主产区、欠发达地区提高补贴标准,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根据不同经营主体的规模、技术水平、绿色生产成效,制定差异化的补贴标准,对小农户降低补贴门槛、提高补贴比例,对绿色生产成效显著的经营

主体实施“增量补贴”，实现“优质优补”。同时，适当提高补贴额度，确保补贴资金能够有效覆盖农户绿色转型的额外成本，增强补贴政策的激励效应。

强化目标协同，实现多元效益统一。将绿色农业补贴政策与乡村振兴战略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农民增收等多元目标深度融合，在政策设计过程中充分考虑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协同提升。例如，在轮作休耕补贴政策中，兼顾耕地生态保护与农户收入保障，对参与轮作休耕的农户给予合理的收入补偿；在绿色技术推广补贴政策中，结合农产品市场需求，推广市场认可度高、附加值高的绿色生产技术，推动绿色农产品“种得出、卖得好”，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8]。

4.2. 健全执行机制，提升政策落地效率与质量

针对政策执行层面存在的问题，应进一步健全执行机制，优化执行流程，强化执行监督，提升政策的落地效率与实施质量，确保补贴政策真正惠及各类经营主体。

一是建立精准识别体系，杜绝“补贴与生产脱节”。依托全国农业补贴大数据平台，整合土地确权、种植备案、绿色认证、土地流转等相关数据，构建“主体-地块-生产”三位一体的补贴对象精准识别系统，实现补贴对象的精准定位。明确规定补贴资金向“实际从事绿色农业生产的主体”倾斜，严格区分土地承包者与实际生产者，确保补贴资金真正用于绿色农业生产，杜绝“补贴与生产脱节”的现象。同时，加强补贴政策的宣传推广，通过乡村广播、微信群、入户走访等多种方式，提高农户与经营主体对补贴政策的知晓度，确保符合条件的主体能够及时申报补贴。

简化申报流程，提升服务水平。推行“一网通办、一卡直达”的补贴申报发放模式，整合各部门的申报流程，实现补贴申请、审核、公示、发放全程线上化，减少纸质材料提交，压缩审批时限至15~30天。推行“容缺受理”“告知承诺制”，为农户与经营主体提供便捷高效的申报服务；在乡镇设立绿色农业补贴服务窗口，配备专业工作人员，为小农户提供申报代办、政策咨询、技术指导等全方位服务，提高小农户的申报成功率。

强化区域协同，推动政策均衡落地。加大中央财政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弥补地方财政配套资金不足的问题，缩小区域间补贴标准的差距，实现补贴政策的均衡覆盖。建立“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落实”的政策执行机制，将绿色农业补贴政策的落地成效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体系，明确各级政府的责任分工，加强对政策执行过程的监督检查，严厉查处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敷衍了事、弄虚作假等行为，推动政策落地见效，破解“上热下冷”的执行困境[9]。

4.3. 完善监管评估，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构建完善的监管评估体系，是保障补贴资金安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的关键。应进一步强化监管力度，健全绩效评估机制，优化资金配置，提升补贴资金的使用效益。

构建全过程监管体系，强化资金监管。运用卫星遥感、大数据、区块链等现代信息技术，建立绿色农业生产全程监测系统，实现对补贴对象生产行为、补贴资金使用情况的实时监测与动态监管。建立“部门监管+第三方审计+社会监督”的多元监管机制，明确农业、财政、环保等部门的监管职责，引入第三方审计机构对补贴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审计，公开补贴名单、补贴金额、实施成效等信息，接受社会公众监督。严厉打击虚报冒领、截留挪用、骗补等违规违纪行为，建立失信主体“黑名单”制度，对失信主体取消3~5年的补贴资格，形成有力震慑。

健全绩效评估机制，强化激励约束。构建涵盖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综合绩效评价体系，其中，生态效益重点考核化肥农药减量、耕地质量提升、农业污染减排等指标；经济效益重点考核农户增收、产业增效、绿色农产品市场规模等指标；社会效益重点考核小农户受益率、政策满意度、绿色生

产理念普及程度等指标。采用“年度评估 + 动态调整”的方式，定期对绿色农业补贴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估，将评估结果与后续补贴资金分配、项目立项等直接挂钩，对实施效果好的地区与主体给予奖励，对实施效果差的地区与主体进行约谈、督促整改，形成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

整合资金资源，优化资金投向。打破部门分割，加强农业、财政、环保等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整合分散的绿色农业补贴资金，设立“乡村振兴绿色农业发展专项基金”，实现补贴资金的集中管理、统一分配、精准使用。优化资金投向，将补贴资金重点投向绿色农业关键技术研发、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小农户绿色转型、绿色农产品品牌建设等薄弱环节，避免资金碎片化与重复补贴，提升补贴资金的边际效益，提高资金使用效率[10]。

4.4. 聚焦主体适配，保障小农户共享政策红利

小农户是我国农业生产的主体，也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参与者与受益者。应聚焦小农户的需求，优化补贴政策设计，完善配套服务，推动小农户融入绿色农业发展体系，保障小农户共享政策红利。

降低准入门槛，扩大补贴覆盖范围。取消绿色农业补贴项目中不合理的规模门槛与资质门槛，设立“小农户绿色生产专项补贴”，专门针对小农户的绿色生产需求提供补贴支持。降低小农户的绿色转型成本，让更多小农户能够参与到绿色农业发展中来，享受补贴政策红利。

创新补贴方式，提升小农户受益水平。推行“物化补贴 + 服务补贴 + 现金补贴”的组合补贴模式，为小农户免费提供绿色生产技术、优质农资、技术培训等服务，减少小农户的现金支出；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带动，实现“小农户 + 新型主体 + 补贴政策”的联动发展，让小农户通过参与规模化、标准化绿色生产，获得更多的补贴收益与生产收益。同时，适当提高小农户在补贴资金分配中的比例，缩小不同经营主体之间的受益差距，实现补贴政策的普惠性。

强化能力支撑，提升小农户绿色转型能力。将绿色生产技术培训纳入绿色农业补贴配套体系，每年开展专项技术培训，邀请农业技术专家为小农户讲解绿色种植、养殖技术、农业废弃物处理技术等，提升小农户的绿色生产技术水平。建设基层绿色农业技术推广队伍，为小农户提供“一对一”的技术指导服务，及时解决小农户在绿色生产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难题。同时，加强市场信息服务，为小农户提供绿色农产品市场需求、价格走势等信息，帮助小农户对接市场，解决绿色农产品“卖难”问题。

5. 结论与展望

乡村振兴背景下，我国绿色农业补贴政策作为推动农业绿色转型、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制度工具，经过多年的实践与完善，已逐步构建起较为完整的政策体系，补贴规模持续扩大、覆盖范围不断延伸，在生态环境保护、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农民增收致富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为农业绿色发展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提供了有力支撑。然而，在政策实施过程中，由于政策设计不够科学、执行机制不够顺畅、监管评估体系不够完善、主体适配性不足等多重因素影响，绿色农业补贴政策仍存在补贴结构失衡、精准性不足、监管缺位、小农户受益有限等突出问题，政策实施效果与预期目标仍存在一定差距。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纵深推进与农业发展的不断加快，绿色农业补贴政策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逐步朝着数字化、生态化、融合化、长效化的方向发展。在数字化方面，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卫星遥感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绿色农业补贴的精准识别、全程监管、绩效评估等环节将实现数字化升级，补贴精准度与监管效率将大幅提升，有效解决信息不对称、监管成本高、执行效率低等问题。

参考文献

- [1] 高玉强, 吕若菡, 张琦, 等. 绿色农业补贴政策的减污降碳协同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J/OL]. 中北大学学报(社会

- 科学版): 1-11. <https://link.cnki.net/urlid/14.1329.c.20260323.1329.002>, 2026-04-18.
- [2] 张征华, 张小英, 肖宇雄, 等. 绿色农业补贴对农民合作社绿色生产的影响研究[J/OL].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1-13. <https://link.cnki.net/urlid/11.3513.S.20260313.1014.003>, 2026-04-18.
- [3] 高玉强, 张琦, 王子帅. 绿色农业补贴政策的面源污染减排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J]. 治理现代化研究, 2025, 41(5): 83-96.
- [4] 彭聪聪, 聂志平, 凌勇康. 小农户参与绿色农业生产: 内在价值、现实困境与发展出路[J]. 广西农学报, 2024, 39(6): 64-69.
- [5] 杨露, 高杰. 碳中和背景下我国农业绿色补贴的农户收入改善与效果评价[J]. 农业经济, 2024(5): 110-112.
- [6] 帅清华, 甘黎黎. 农业面源污染治理视野下农业补贴政策存在的问题及优化策略[J]. 产业与科技论坛, 2024, 23(2): 28-31.
- [7] 王昊. 农业补贴政策的发展与完善[J]. 智慧农业导刊, 2023, 3(24): 117-120.
- [8] 梁睿. 我国绿色农业补贴政策体系建构研究[J]. 行政论坛, 2020, 27(1): 56-62.
- [9] 董煜. 订单农业供应链融资中的财政补贴机制研究[J]. 新农业, 2022(11): 76-77.
- [10] 冯梦金, 孙雪峰, 张成堂, 等. 政府补贴对农产品供应链绿色生产影响[J]. 河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4(2): 43-52.